

# 霞浦摩尼教观音、弥勒、泗洲大圣崇拜考<sup>\*</sup>

杨富学<sup>\*\*</sup> 彭晓静<sup>\*\*\*</sup>

**内容提要** 在霞浦摩尼教文献《乐山堂神记》《求雨秘诀》《祷雨疏》等科仪文书，特别是经典性著作《摩尼光佛》中，观音、弥勒极受崇拜，霞浦本地的文物遗存中亦多处可见。多种信仰的融合共存，除却摩尼教教义体系的渊源之外，更多是对佛教的借用和依托，也是对道教的比附。观音信仰和弥勒信仰在汉传佛教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泗洲大圣崇拜总体上说也属于佛教，但蕴含了非常多道教和民间信仰的成分。霞浦摩尼教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和佛道相比显然属于小众，故而不得不借由佛教、道教的巨大影响力以达弘法并壮大自己之目的，霞浦摩尼教堪称波斯摩尼教中国化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 霞浦摩尼教 观音 弥勒 《摩尼光佛》

## 一 霞浦摩尼教中的观音崇拜

观音，在西晋太康七年（286）汉译《正法华经》中写作“光世音”。顾名思义，“光世音”本身并没有“可观全世”的含义，而只有“救苦救难”之意蕴。《正法华经》卷十有言：

于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露右臂，长跪叉手，前白佛言：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霞浦摩尼教研究”（编号：14XZS001）阶段性成果。

\*\* 杨富学，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与古代宗教研究。

\*\*\* 彭晓静，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馆员，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

“唯然世尊!所以名之光世音乎?义何所趣耶?”佛告无尽意曰:“此族姓子!若有众生,遭亿百千垓困厄患难苦毒无量,适闻光世音菩萨名者,辄得解脱无有众恼,故名光世音……世世安隐至无极慧,其光世音,神足变化普至道门,所显威神而无穷极。”佛说是普门道品,彼时会中八万四千人,至无等伦,寻发无上正真道意。<sup>①</sup>

“观世音”一词,最早见于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同一时期还有上文提到的《正法华经》中的“光世音”一词。此后,西晋竺法护译作“光世音”;后秦鸠摩罗什译作“观世音”,佛教色彩更浓;玄奘的翻译则根据印度的佛教典籍。早期的观音,均为男身,在中国,直到宋朝才出现女身观音。

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佛教,而在古代印度观音到底来自何处,却是众说纷纭。观音信仰在其产生之后的发展盘根错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观音信仰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而盛行的,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出现在各种宗教中。

2008年,福建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宋元以来的摩尼教文献、文物与古遗迹,继之,福州福寿宫、屏南降龙村、福清高山镇也相继发现了摩尼教寺院遗迹、文物、文献。大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属于霞浦摩尼教系统,除具有经典性质的著作《摩尼光佛》外,其余均为科仪书或表文。在这些祈神的科仪文本中,观音菩萨及其化身,成为所有祈请诸神中不可或缺的神祇之一,列举如下:

1. 《乐山堂神记》第6行:“观音、势至二大菩萨。”<sup>②</sup>
2. 《明门初传请本师》第4行:“大圣观音、势至菩萨、惠明法相如来。”
3. 《摩尼光佛》第153行有“势至变化观音初,直入大明降吉祥”之语;第421行又有“志心皈命,礼观音、势至二尊菩萨”之载。<sup>③</sup>

① (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十《光世音普门品》,《大正藏》第9册, No.263, 第128页。

②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③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寒山寺佛学》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第89、103页。

4. 《求雨秘诀》第16~19行有“贞明大圣、日月光佛、天地化身净风大圣，观音、势至二大菩萨，文殊、普贤二大菩萨”之载。

5. 《祷雨疏》三见，分别为第11行：“通传善信观音大士，奏告吉祥，势至能仁”；第160行（《申唤应》第2行）：“通传善信观音大士，奏告吉祥，势至能仁”；第370行（《谢雨申唤应》第4行）：“通传善信观音大士。”

新近于福建屏南降龙村发现的《贞明开正文科》亦二度提到观音，其中第6行曰：“势至便化观音出，直入大明降吉祥”；第161行曰：“精进净风佛，再苏净明佛，微妙净水佛。”

不唯如此，观音还被赋予了祈雨功能。在霞浦发现的祈雨科仪文本中，观音大士成为祈雨仪式中首位要祈求的神灵，如：

1. 《点灯七层科册》第47~48行：“一心奉请，翠竹林中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惟愿此夜今时，请降香筵，证明修奉。观音菩萨临法会，请降香筵作证明。”

2. 《奏申牒疏科册》第13行：“观音普陀胜境，势至七珍山中，观音势至各宫额”；第86~87行“凭兹经典，直至翠竹林中，瞻礼观音大士之前；乘此杆功，经往西竺国内，长侍摩耶夫人之侧。”

3. 《冥福请佛文》第22~24行：“大愿行深普贤菩萨、灵感观世音菩萨。”<sup>①</sup>

在敦煌本摩尼教文献中，观音仅一见，即S.2659《下部赞》尾部第390~391行：“对卢舍那，大庄严柱，五妙相身，观音势至。”<sup>②</sup> 观音其名蕴含了菩萨大慈大悲、济世的功德和思想，居佛教诸大菩萨之首，是中国各地佛教信徒最崇奉的菩萨，拥有的信徒最多，影响最大。

以上霞浦所存科仪文本可见，观音菩萨在摩尼教的祈请仪式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构成性神灵。直到今天，在霞浦县上万村尚有观音阁（见图1）留存，内置多种摩尼教遗物，成为当地村民的宗教活动场所。

① 杨富学、史亚军、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冥福请佛文〉校录研究》，高国祥主编《文献研究》第4辑，学苑出版社，2014，第87~8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56页。录文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第264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8页。



图 1 霞浦县上万村观音阁内景

上万村临清桥东侧的观音阁始建于明天顺四年（1460），整个建筑分三部分，前有民国十六年（1927）重修的门亭，中间为天井，后为正殿。殿内较为醒目的、当属辉绿岩质地的神龛佛座，正面压条刻莲花瓣纹饰，中间刻竹节纹四立柱，中嵌三堵图案，中堵刻两只螭虎，左右两侧刻牡丹图案。佛座两侧刻有建造时间和捐款名单。

除佛道外，福建当地所崇奉的神祇，除泗州文佛（见后）外，还有顺懿夫人也进入摩尼教的万神殿。《乐山堂神记》第 34 行有“祖婆陈氏顺懿夫人”之谓。<sup>①</sup>《兴福祖庆诞科》第 83 行有“叩请兴福雷使、顺懿夫人”。<sup>②</sup>同样的内容还见于该文献第 99、108 和 156 行。此外，《奏申牒疏科册》第 17 行“敕封临水淑靖元君三位夫人”。尤有进者，《祷雨疏》第 205~209 行中有《牒夫人》一节：

得此除已具奏天庭外合行移文牒，请临水正宫，请照验详前事理，乞应今夜请降道场，证明修奉，会同城隍、当境云雷雨部，关给五湖、四海、溪源、潭洞行雨龙神，即刻兴云布雨，普天降下济润，禾苗秀

①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 年第 4 期。

② 计佳辰：《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第 10 页。

实，五谷丰登。牒到，火急奉行，须至牒者。右牒，请临水崇福大君、元君，灵通有感三位舍人，照验谨牒。

顺懿夫人，又称临水夫人、大奶夫人、顺天圣母、三山女神，是闽山三奶派的重要女神。据传，陈夫人名靖姑，或名进姑。一说福建古田人，一说福州人。元代张以宁（1301~1370）《古田县临水顺懿庙记》载：“古田东去邑卅里，其地曰临川，庙曰顺懿。其神姓神氏，肇基于唐，赐敕额于宋，封顺懿夫人。英灵著于八闽，施及于朔南。”<sup>①</sup>这是目前所见记载顺懿夫人最早的文献资料。以后，关于顺懿夫人的记载渐趋详备，如明嘉靖《罗川志》崇福宫条载：“其神姓陈，讳靖姑，生于唐大历元年正月十五日，福州下渡人。适本县霍口里西洋黄演，由巫为神，乡人祀之，祷雨暘，驱旱疠，与凡祈年求嗣，无不立应。宋端平（1234~1236）、淳祐（1241~1252）年间，状其绩于朝，赐额顺懿夫人，封崇福昭应慈济之神。”清代史书与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大多都沿袭明代而来。顺懿夫人是福建和台湾民众崇奉的女神，其信徒则遍布浙江、江苏以及东南亚，福州裔信徒视其为乡里守护神。其他地区的信徒，则多视其为妇女、儿童的保护神。顺懿夫人信仰非常昌盛，以其能护佑生产闻名。据传，陈靖姑的身世系由观音指血而生，为佛教之属，但她又修习闽山道法，此法属于巫术与道术的混合体。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据传也曾修习闽山道法。<sup>②</sup>

福建福州的摩尼教遗址福寿宫中（图2），也可见观音信仰的存在。福寿宫大殿主供两侧各有偏殿，其中左侧为临水夫人殿（供奉临水夫人陈靖姑），右侧自左向右分别有观音阁（供奉观音菩萨）、华光殿（供奉华光大帝马天君）和大王殿（供奉黄大王、赵大王）。观音阁供奉观音菩萨。<sup>③</sup>观音信仰在中国传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福建地区，现存的石雕、木刻、瓷塑造像很多。

①（明）张以宁：《翠屏集》卷4，鹭江出版社，2012，第202页。

②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杨富学、彭晓静：《福州福寿宫摩尼光佛像杂考》，《形象史学研究》（2015年下半年），人民出版社，2016，第150页。

③ 彭晓静、杨富学：《福州福寿宫摩尼教神祇探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



图2 福州福寿宫外观

福寿宫所供奉观音为铜质塑像。福建临海，故观世音菩萨在当地信徒心中能够“祈晴祷雨，逐疫驱瘟。八闽有活佛之称，重泽救波臣之厄，固已灵昭中外，福被人天矣”。<sup>①</sup> 观世音菩萨不仅能治病、护航、临危救难、保佑出家，还是真善美的化身，桥梁的守护神。洪迈在《夷坚志》记载了一则观音为人治病的灵验故事：

泉州商客七人：曰陈、曰刘、曰吴、曰张、曰李、曰余、曰蔡，绍熙元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余客者，常时持诵救苦观音菩萨。饮食坐卧，声不绝口，人称余观音。然是行也，才离岸三日得疾，旋即困忌。海船中最忌有病死者。众就山岸缚茅舍一间，置米菜灯烛并药饵，扶余入处，相与诀别曰：“苟得平安，船回至此，不妨同载。”余悲泣无奈。遥望着普陀山，连声念菩萨不已。众尽闻菩萨于空中说法，渐觉在近，见一僧左手持锡杖，右手执净瓶，径到茅舍，以瓶内水付余饮之，病豁然脱体，逐复还舟。<sup>②</sup>

观音救海难信仰形成后逐渐扩大到整个救难信仰，传说中在印度大陆和斯里兰卡之间救海难的宝马逐渐转变为仙人、佛陀，最后则被定位于观

① (清)郑怀棣：《重修安海龙山寺后殿疏》，《安海志》卷16《龙山寺》，《安海志》修编小组内部铅印本，1983，第196页。

② (宋)洪迈：《夷坚三志己》卷2《余观音》，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1318页。

音。<sup>①</sup>如圣印法师认为，“当时（指5世纪——笔者注），印度人航海经商，尤其是往师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贸易，来往船只就都供奉观音菩萨以求平安。这么看来，南印度人已视观音菩萨为海上的守护神，正如同福建及台湾地区以妈祖为海上的保护神一样”。<sup>②</sup>显而易见，在福建民间已把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当作民间俗神来供奉，观音菩萨的民俗化几乎达到“户户观世音”的程度。<sup>③</sup>观音菩萨信仰同天神信仰融为一体并普及民间，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思想形象化、通俗化传播的结果。<sup>④</sup>

摩尼教对观音的崇拜除了佛教所讲的种种因缘之外，还在于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之初，社会动荡、苦难深重的社会背景使广大民众祈求有一位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在频繁的天灾人祸面前，束手无策、陷于失望甚至绝望境地的平民百姓，需要这样的救世主。社会的动乱促使中国民众很快选择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但若从更深层次去追溯摩尼教对观音崇拜的话，无疑是其最初的教义和提倡的理念。上文已述，观世音又称光世音。霍尔特（John Clifford Holt）从大众部的经典《大事》中举出很多词，如“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照亮世界就像太阳照亮天空”（lighting up the world as the sun lights up the sky）等，并认为这些特征正是后来观音的信仰源泉。<sup>⑤</sup>众所周知，摩尼教在创教之初即提出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把宇宙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期）理论。不仅敦煌文献有载，最近于福清市高山镇发现的摩尼教抄本《水路灯科文》也有“摩尼佛大明天，显三际二宗……遮夷但，伽度师，光明众，志心齐”之语。<sup>⑥</sup>该教崇拜大明神，将现世视作黑暗王国，追求光明王国。摩尼自称“光明使者”，并坚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善

① 李利安：《论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圣印：《普门户户有观音——观音就苦法门》，圆明出版社，1995，第28~29页。

③ 李玉昆：《泉州民间信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第299页。

④ 楼宇烈：《东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

⑤ John Clifford Holt, *Buddha in the Crown: Avalokiteśvara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of Sri Lanka*,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

⑥ 李林洲：《福清发现摩尼教经典科仪文本文物》，《福州晚报》2017年6月19日。

良必将战胜邪恶。“光”是摩尼教教义中最重要的因素。<sup>①</sup>正是缘于摩尼教对光明的崇奉,象征光明的日月在摩尼教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奉日月为真神,成为摩尼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之一,即使在中国摩尼教与西方摩尼教脱离接触后很久,他们仍然保持着对日月的崇拜。<sup>②</sup>

摩尼教有“朝拜日,夜拜月”之俗,《闽书》记曰:“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sup>③</sup>《宋会要辑稿》称明教徒所念经文中有《日光偈》《月光偈》。<sup>④</sup>唐代敦煌写本《摩尼教残经》中亦载:“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sup>⑤</sup>庄绰《鸡肋编》记载:“事魔食菜……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sup>⑥</sup>这些都可证明,中国摩尼教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崇拜日月的特点,与原始摩尼教同根共性,遵循的是正统摩尼教的传统。<sup>⑦</sup>同时,传统摩尼教崇尚光明、鞭挞黑暗的教义思想,对于贫苦农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故流传甚炽,不劝自盛,至南宋初期,其势力遍布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尤以闽浙为最胜,成为诸民间教门之首。<sup>⑧</sup>

关于观音信仰的另一宗教渊源,马满(Mallmann)指早期观音信仰经典《无量寿经》中描写阿弥陀佛是“无量光”,而作为胁侍的观音也被描写成充满光芒,所以,马满认为观音菩萨是从伊朗祆教中衍生出来的一位太阳之神。<sup>⑨</sup>众所周知,摩尼教起源于波斯,且是在祆教马兹达教义及基督教影响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所以两个宗教同根同源,有共通的教义和信奉的神明,自不待言。

① 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33页。

② 杨富学、彭晓静:《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与原委》,《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③ (明)何乔远编撰,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卷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第171页。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八,中华书局,1957,第6534页。

⑤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362页。录文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第264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372页。

⑥ (南宋)庄绰:《鸡肋篇》,中华书局,1983,第11页。

⑦ 马小鹤、芮传明:《摩尼教“朝拜日,夜拜月”研究》,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5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263~281页;第1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326~342页。

⑧ 杨富学、彭晓静:《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与原委》,《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⑨ Marie-Therese de Mallmann, *Introduction a l'Etude d'Avalokitesvara*, Pari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1948, p. 82.



毫无疑问，光明是摩尼教最为崇拜的元素，因此，该教亦称“光明之教（the Religion of Light）”，即明教也。有人认为摩尼教教主摩尼（Mani）之名或许是来源于巴比伦——阿拉米语作 Mânâ，乃曼达派（Mandaeans）一位光明神之名，mânâ rabba 义为“明王”。<sup>①</sup> 显然摩尼教主在创教之初便自称 Mani，有光明之意，更是此称号有尊崇之意。<sup>②</sup> 摩尼教神学中也有许多的“明父”（Fathers of Light），另有明友（Beloved of the Light）、光耀柱（Pillar of Glory）、明女（Virgin of Light）及明心（Light Mind）等，庶几皆为摩尼教主神。而“摩尼”称呼之本身应来自佛教术语——释迦牟尼，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充斥着佛教术语、佛教思想和佛教仪式，<sup>③</sup> 就摩尼教之诞生传说而言，也主要借用佛教的传说，同时也比附道教，颇值得注意。<sup>④</sup> 对佛教的依托，是摩尼教固有的现象，尤其在入华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作为佛教信仰中最重要的观音菩萨，自然成为其信奉的主神之一。

## 二 摩尼之名号与弥勒崇拜

弥勒信仰古已有之，大约始于南北朝时期，经千百年流传，仍兴盛于民间，其教义和神学渐多演变，融入了许多其他文化因素。特别是，弥勒信仰中的某些因素与摩尼教十分相似，如崇拜光明、崇尚白衣、严格的素食规定等，遂致学界认同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乃至最终融合成某种新的信仰。<sup>⑤</sup>

在霞浦摩尼教文献中，直接称摩尼为“弥勒”，二者的趋同性显而易见。《摩尼光佛》中多次称或暗示其为弥勒的化身，如第 206 行：“阐如来藏，八面玲珑弥勒龛”，<sup>⑥</sup> 如第 629 行“受记明童迎后圣，愿为我等布津

① J. P. Arenden, Manichaeism, *Catholic Encyclopedia*,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591a.htm>.

② 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 67 页。

③ 杨富学、包朗：《从霞浦本〈摩尼光佛〉看摩尼教对佛教的依托》，《宗教学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④ 包朗、杨富学：《摩尼教对佛道降诞传说的比附与改造》，《文史》2016 年第 4 辑。

⑤ 马西沙：《历史上的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宗教哲学》第 36 期，2006，第 1~13 页。

⑥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第 91 页。

梁”。<sup>①</sup> 其中的“受记”之谓即指弥勒也。《摩尼光佛》第 235 行《天女咒》又称之为“弥驮和【口 + 在】”，<sup>②</sup>《兴福祖庆诞科·天地咒》则写作“和呼弥哆”，<sup>③</sup> 其意皆为“善善弥勒”，亦即“善善摩尼”之意，<sup>④</sup> 而“弥勒菩萨，获色如示能讫”，赞弥勒（摩尼）之清净救世，含义就更显明了。<sup>⑤</sup> 按吐鲁番出土帕提亚语文献残片 M 42 记载，在救世主耶稣及其前身“少年耶稣”之间曾有一次对话，其中言道，少年尚记得佛祖释迦牟尼的相貌，并且说：“佛祖对那些他认为是印度人当中幸运的灵魂打开了那扇救赎之门。”接着，救世主提醒少年：“在他（佛祖）入般涅槃时，他曾告诉你：‘于此等待弥勒佛吧。’”<sup>⑥</sup>

对于摩尼教徒来说，摩尼就是弥勒佛，因为耶稣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 15、26 章中承诺过他作为圣灵，他将会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重新出现于尘世。<sup>⑦</sup> 在一首庇麻节（Bema）赞美诗中，摩尼像被置于祭坛上，信众用庄严的诗句致辞：“弥勒佛降生了，末摩尼，那个使徒，他从上帝耶稣那儿带来了胜利（救赎）。”<sup>⑧</sup> 摩尼在世界末日返回尘世是可以预期的，故而信众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未来佛。“受记明童迎后圣”正书写了释迦佛授记摩尼佛成为未来佛，亦即所谓“后圣”的情景。

这一情节形成的时代有可能为北宋时期。《宋会要辑稿》记载明教之人所念不根经文中即有《太子下生经》。<sup>⑨</sup> 考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

①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第 113 页。

②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第 93 页。

③ 计佳辰：《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研究》，第 9 页。

④ 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商务印书馆，2016，第 122 页。

⑤ 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第 124 页。

⑥ J. P. Asmussen, *Manichaean Literature*, New York 1975, pp. 110 - 111; H. -J. Klimkeit, *Christians, Buddhists and Manichaeans in Medieval Central Asia*,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 1, 1981, pp. 49 - 50. [德] 克林凯特：《中古中亚之基督教、佛教和摩尼教》，叶佳敏、陈瑞莲译，杨富学校，收入《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第 197 页。

⑦ H. -J. Klimkeit, *Jesus Entry into Parinirvāna Manichaean Identity in Buddhist Central Asia*, *Numen* Vol. 33, Fasc. 2, 1986, p. 227; [德] 克林凯特：《耶稣涅槃——中亚摩尼教对佛教的依托》，陈瑞莲、杨富学译，收入《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第 181 页。

⑧ W. B. Henning, *Ein manichäisches Bet- und Beichtbuch*,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6 - 10, S. 20 - 21.

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八，第 6534 页。

有摩尼在苏邻国“示为太子”<sup>①</sup>之说，则“太子”无疑即指摩尼而言。《太子下生经》于今已不得见，但从其题名可知当对佛典之《弥勒下生经》有所模仿。

《摩尼光佛》有《下生赞》，<sup>②</sup>仿自佛教释迦降诞故事，当即《太子下生经》之一种版本，而其反映摩尼“将花诞出诣娇培，涌化胷间”“四岁出家”“十三成道”及感动“十方诸佛”“三毒魔王”，说动波斯国王及“四维上中下”悉数皈依等句，则不仅模仿释迦，更似模仿弥勒。晋人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及唐义净三藏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云“弥勒菩萨于兜率天观察父母不老不少”，<sup>③</sup>便“来托彼夫人，作后身生处”，<sup>④</sup>其母“徐立攀花树，俄诞圣慈尊”。弥勒从母之右胁出生，此时诸天为之震动，纷纷前来护持。<sup>⑤</sup>弥勒不乐在家，“未经几时，便当出家学道”，夜坐于龙华树下，“其夜成无上道”。龙华三会三次召开，度无数出家，甚至国王也舍俗愿为沙门。<sup>⑥</sup>

弥勒之托孕、出生，惊动诸天神佛及其年少得道，促成国王皈依之故事与《下生赞》摩尼下生故事多有雷同。故知无论中亚抑或中国，摩尼一直攀附弥勒，“摩尼即弥勒”说在宋代当十分流行。宋元二代以弥勒佛下生为号发动的起义不胜枚举，最著名者如北宋之王则起义与元末之红巾军起义。前者公然打出旗号“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这些次起义事件似乎都与“魔教”亦即摩尼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弥勒与摩尼的信仰确已合流，而上引《摩尼光佛》之《天女呪》《下生赞》等当即这一合流的产物。

另外，在中亚的突厥文、帕提亚文等语种的摩尼教文书中，“弥勒”之名又被借用，用以指称救世主夷数。夷数在摩尼教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1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72页；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47页。

②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第96~97页。

③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藏》第14册，No.453，第421页。

④ （唐）义净三藏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第14册，No.455，第426页。摩尼于苏邻国由“老君托孕”“示为太子”而下生，恐亦经过这一从天入地的过程。

⑤ （唐）义净三藏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第14册，No.455，第427页。

⑥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藏》第14册，No.453，第422页。

原型耶稣在基督教里所扮演者,亦即未来的救世主。<sup>①</sup>若将夷数与摩尼相比较,其“救世主”的色彩更为鲜明。由此,摩尼教中的“弥勒—救世主”信仰与基督教似乎更有渊源。但也不排除,摩尼教在东传中亚的初期,就已经开始接受形成于印度的弥勒信仰。后来为了便于传播,更与中国佛教中弥勒信仰产生了极大的亲和力,甚至在某些场合为了生存的需要伪装成弥勒信仰或其他大众迷信形式的可能性。但总体而言,双方进行交流,相互借鉴对方的某些观念和教义,这一点毋庸置疑。

### 三 霞浦摩尼教中的泗洲大圣信仰

泗洲大圣,即通常所谓的僧伽大师,为唐初由中亚入华的一名粟特高僧。据载,僧伽“在本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sup>②</sup>唐高宗“龙朔初(661),忽乎西来,飘然东化。独步三界,遍游十方”,<sup>③</sup>始至西凉,次历江淮,建泗州普光王寺,后入长安,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被奉为国师。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俨然坐亡,神彩犹生,止瞑目耳。俗龄八十三,法腊罔知。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sup>④</sup>向达先生据此推定僧伽入中土之时应在高宗显庆二年(657)前后。<sup>⑤</sup>僧伽和尚经由河西而入内地,在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康熙十九年因淮河洪水而沉入洪泽湖)成名,故而得名泗洲大圣,进而成为泗洲佛,成为中原民众所信奉的至尊。<sup>⑥</sup>

僧伽信仰先后传播至浙、闽、粤、台,及至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今宝

① 杨富学、薛文静:《霞浦摩尼教夷数崇拜考》,《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6期, Yang Fuxue & Xue Wenjing, “Yishu (Jesus) Worship in Xiapu Manichaean Manuscripts,”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Brill, 2018, pp. 97 - 112。

②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61,第448页。

③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58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中华书局,1966,第4529页。

④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范祥雍点校,第448~449页。

⑤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23页。

⑥ 杨富学、张田芳:《从粟特僧侣到中土至尊——僧伽大师信仰形成内在原因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王乐庆、杨富学:《粟特僧伽大师与长安荐福寺》,《第二届西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第33~45页。

祠遍天下”，<sup>①</sup> 福建一带更是兴盛，清人施鸿保《闽杂记》载：“福省城中街巷间，多供泗洲文佛，或作小龕，或凿壁为龕，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但凿四字壁上以供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sup>②</sup> 福建地区以僧伽名号建立和保留的院、寺、堂、庵、殿等为数不少，如厦门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朝会昌、大中年间（847～859），初名“泗州寺”，五代时曾称“泗州院”，宋代称“无尽岩”，后又改称“普照寺”；泉州开元寺内原建有“泗州院”，福清市道教圣地石竹山也建有“泗洲殿”。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地区至少有45个与僧伽信仰有关的泗州院、堂等。<sup>③</sup>

泗洲大圣信仰对福建地区的摩尼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观音亭神龕两边还有一副对联曰：“洲从泗出方显圣，佛以文名始见灵。”其撰写时代未知，据推测，应为明清以后之物，其中隐含有“泗洲文佛”四字。<sup>④</sup> “显圣”“见灵”之谓应与僧伽的种种神通力，尤其是预知未来的神通有关。观音阁内还保存有明正德年间三佛塔的石头构件。其中一尊雕像有内外光环，但无光线之纹，佛像头巾盖头，坐于莲花座上，服侍为袈裟，双手藏抱于袖内，置于座前。其造型与泗洲文佛造像相似，疑为泗洲文佛。

距离柏洋乡不远之霞浦县盐田畚族乡北洋村有“飞路塔”，塔龕上刻“飞路塔四洲佛”字样（图3），它内有信众所奉牌匾，上书：“圣德常照境太平，佛光普照人康乐。四洲文佛。霞浦县北洋乡弟子黄□□。”塔右侧为签室，墙壁上绘《北洋飞头塔泗洲文佛灵感签诗谱》，<sup>⑤</sup> 占卜意味非常明显。除了墙壁上的《诗谱》外，签室内还保存有大量的签诗纸条。相较而言，《诗谱》之摩尼教意味不明显，不若纸条签诗那样摩尼教意味浓厚，后者很多与晋江草庵所见签诗相同。<sup>⑥</sup> 足见泗洲文佛——泗洲僧伽被视为明教门消

①（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4《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施鸿保：《闽杂记》卷5，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83页。

③林晓君：《泗洲佛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第44页。

④林子周：《福建霞浦与福州福寿宫摩尼教文物比较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⑤杨富学、李晓燕、彭晓静：《福建摩尼教遗存踏查之主要收获》，《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

⑥关于晋江草庵摩尼教诗签，请参见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第92～110页；粘良图：《晋江草庵签诗探源》，《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化后的当地神明，占卜意味浓厚。在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文献《祷雨疏》第78行中亦赫然可见“泗洲佛”与“贞明独觉佛”和“真武帝”并列。摩尼教祈雨文书《求雨秘诀》中第20行亦有“泗洲文佛僧迦耶菩萨”之语。



图3 霞浦盐田飞路塔泗洲佛

泗洲大圣在福建摩尼教徒众广为流传，应是受到当地佛教信仰的影响，同时一个因素也不应忽视，即僧伽大师来自粟特，而回鹘与中原摩尼教也皆由粟特传入，<sup>①</sup>这个缘故，也可能是摩尼教对僧伽大师格外敬奉的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霞浦发现的两件摩尼教祈雨文书，即《祷雨疏》和《求雨秘诀》中都有泗洲大圣在列，应与其善于祈雨有关。《太平广记》记载：

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准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案：明抄本、陈校本“字”作“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

①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总97辑）；杨富学：《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31~256页。

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sup>①</sup>

《神僧传》等文献中亦有相关记载：“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sup>②</sup> 宋人蒋之奇《泗洲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载：“中宗景龙二年（708）畿内不雨。帝语师曰：‘京畿久旱，祈祷未效，愿师慈悲，以纾朕忧。’师以瓶水散洒，有顷云起而雨，畿内霑足。”<sup>③</sup>

由于泗洲大圣以善于祈雨而闻名，借助泗洲大圣之灵塔祈雨也屡屡显示其灵验。一代大文豪苏轼曾于泗州僧伽塔下祈雨救民。<sup>④</sup> 尽管苏轼笔下的祈雨祭文甚多，但从此文仍不难窥见他对僧伽大师祈雨神力之景仰。

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也以善于祈雨而闻名，笔者曾有专文研究，兹不复赘。<sup>⑤</sup> 又泗洲大圣由于生前造福于民众，坐化之后被视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宋高僧传·僧伽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帝（中宗孝和帝）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不可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sup>⑥</sup> 泗洲大圣信仰在东南沿海等地广传，对佛教、摩尼教和社会民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四 结论

霞浦摩尼教中观音、弥勒和泗洲大圣的信仰，体现了摩尼教由波斯入华后与中土多种信仰文化的融会贯通。这些信仰并不是在摩尼教在波斯建教之初就在其教义之内，是随着摩尼教的传播在不同时间段进入其信仰体系的。早期弥勒信仰，与基督教有着紧密的联系；正统佛教中的观音信仰伴随着摩尼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演变，甚至将民间信仰中的诸位神明附会

①（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96“僧伽大师”条，中华书局，1961，第638页。

②（明）朱棣：《神僧传》卷7，明永乐十五年内府刻本，第273页。

③（宋）蒋之奇：《泗洲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生存应化灵异一十八种》第17，“应诏以瓶水致雨畿内”，明万历十九（1591）李元嗣刻本，第831页。

④（宋）苏轼：《苏轼文集》卷62《祈雨僧伽塔祝文》，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1926页。

⑤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⑥（宋）赞宁：《宋高僧传》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范祥雍点校，第448页。

成观音化身；泗州大圣信仰则深受回鹘摩尼教的影响，又与霞浦民间信仰相结合。不管是观音信仰、弥勒信仰，还是泗州大圣崇拜，都是摩尼教对佛教或是其他宗教的依托或借用，摩尼教因此得以融入民间，借由佛道的巨大影响力达弘法之目的。

[责任编辑：闫伟]